



1978—2010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李春——著

当代中国 传媒史（上）

漓江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1978—2010

李春——著

当代中国 传媒史（上）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传媒史:1978—2010 / 李春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407-7106-5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传播媒介－文化史－中国－1978—2010 IV. ①G219. 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1276 号

策 划: 郑纳新
责任编辑: 刘树勇 海健灵
刘 鑫 叶 子
封面设计: 星 星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 253000)
开本: 960mm×690mm 1/16
印张: 61.5 字数: 110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18)

目录

上 册

引子	1
第一章 传媒的一般功能开始恢复(1978—1981)	19
第一节 “政治家办报”写新篇	20
一、抉择与担当：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	20
二、建立规范：“三不”主义与“四项基本原则”	34
第二节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制度的废除	39
一、街头出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小字报和刊物	39
二、删除“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宪法条文	41
三、遏制各种单位自行编印书刊的泛滥态势	43
四、关于立法保护和规范言论自由的呼声	47
第三节 文化饥荒的缓解	49
一、“毒草”作品的复出	49
二、对文艺创作控制的放松	54
三、文化生产的全面启动	60
四、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拖累	67

第四节 学习“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	73
一、抨击“假大空”与“帮八股”文风	73
二、国际报道与政治套话和外交表态的分离	77
三、批评报道及其他负面新闻的恢复	84
四、对新闻职业意识的呼唤	88
五、单纯灌输向告知、说服的转变	98
第五节 行业间行政分工协作的危机	107
一、电影业不再无条件帮助电视台	108
二、电影制片业与发行放映业之间及发行放映业内部的利益之争	113
三、图书发行渠道的多元化	120
第六节 涉足营利活动	123
一、报纸、电视和广播商业广告的恢复	124
二、中央电视台和少数中央级报社获准试行企业化管理	129
三、稿酬的恢复及版权立法的准备	130
四、精神产品商业化的出现	133
本章余话：舶来品	135
 第二章 传媒的总体结构显著分化(1982—1988)	139
第一节 党政部门及人民团体争相创办或扩充传播工具	139
一、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的实行	140
二、新华社重启世界性通讯社计划	146
三、党政部门及相关单位争相办报刊	149
四、图书发行与出版引入系统外力量	152
五、传真、计算机、激光照排、电子采编和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初步应用	155
第二节 中央决心争取舆论主动权	161
一、对外宣传要大胆、全面、活泼、及时	162
二、改进广播电视新闻时效	164

三、增强广播电视节目的交流感	169
四、探索专业化工作机制	175
五、十三大前夕新闻改革方案的出台	181
六、“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0
第三节 事业体制的松动	195
一、集中精力搞宣传：上海广电分权的尝试	196
二、广播电视台系统实行经费包干和多种经营	202
三、报社、通讯社开展多种经营	205
四、出版业实行企业管理、承包制及放松书价与发行渠道管制	
	208
五、行业冲突：计划供纸、邮发合一制度的破裂与广告代理制的受阻	
	216
六、电影制片业投资过热及电影制片与发行冲突的加剧	226
七、保护私权：版权立法工作的展开	232
八、化公为私：许可证、记者证、版面和节目的寻租与“走穴”	236
第四节 精神产品的商业化	240
一、大众化报刊形成气候	240
二、娱乐片的兴起	242
三、通俗文学的流行	247
四、色情暴力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的泛滥	250
第五节 思辨、批判热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危机	251
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大量出版	252
二、文艺作品对中国社会的反思	255
三、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形成声势	260
四、思辨性报道的涌现	262
五、风光名胜片与政论片的风行	270
六、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与建设精神文明	273
七、呼之不出的新闻法	285
本章余话：最大的失误	288

第三章 一场政治风波后的整顿(1989—1991)	291
第一节 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291
一、思想和宣传领域着手反思工作.....	291
二、清扫反动、黄色和其他不良出版物	296
三、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行.....	305
四、加紧国际舆论斗争和对外宣传.....	308
第二节 确立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313
一、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	313
二、以民族优秀文化振奋人民精神.....	319
三、做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323
四、鼓励来自现场的报道.....	326
五、安排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329
六、纪录意识的建立.....	333
第三节 经济困难的加剧与应对	340
一、报纸与读者对公费订阅的依赖.....	341
二、报社要求邮政部门降低发行费.....	342
三、部分报刊增加或转向软性内容.....	346
四、少数广播电台尝试内部管理改革.....	350
五、试探电视剧交易的市场化.....	353
六、电影制片业深陷困境.....	355
七、激光照排等技术的应用	357
第四节 行业失范现象的蔓延与整治	360
一、整治小报、记者站、记者证和电视剧生产许可证	360
二、群众抱怨广告过滥和有偿新闻现象	363
三、制定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366
四、《著作权法》正式通过	369
本章余话:大局	372

第四章 市场化的初潮(1992—1993)	378
第一节 面向市场调整内容结构与形态:报纸、期刊与图书	380
一、许多机关报开设周末版等文化娱乐版面.....	380
二、少数部门和行业机关报转为大众化报纸.....	386
三、稿源紧缺、稿酬上涨与创作的市场化	391
四、文学期刊、专业期刊艰难求存	395
第二节 面向市场调整内容结构和形态:广播电视	399
一、中央电视台决心成为世界一流大台.....	399
二、上海打破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台垄断局面.....	403
三、频道频率激增与节目的匮乏	407
第三节 面向市场扩大传媒自主权	409
一、电视剧投资和交易的市场因素增强.....	409
二、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	413
三、电影统购统销制度的破除.....	416
第四节 突出企业化管理	421
一、多数单位采取内部聘任制或内部奖惩制.....	423
二、极少数单位实行全员聘任制.....	427
三、中央电视台实行编外聘用制和内部承包制.....	429
第五节 宣传阵地受冲击	436
一、记者拿红包	436
二、新闻单位忙创收	439
三、“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央拨款支持的舆论监督	443
四、各种单位争建有线电视网	445
五、境外节目、信号和资金的渗入	449
六、争取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453
本章余话:小人物	459

引 子

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人抱怨这个国家只有“舆论一律”，没有言论自由。对此，新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发表文章予以辩驳。他首先承认，舆论一律“是确实的”，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反革命分子“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毛泽东随即又指出，“我们的舆论”“又是不一律”，就是说，“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①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言论自由是有欺骗性的。陈独秀早就说，“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②。1930 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刊词明确提出，“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基于阶级斗争的实践与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中共在执政前夕就如何处理旧中国遗留的报刊业、出版业、通讯社、广播电台等问题发出指示：报刊业、出版业、通讯社凡属于反动势力或有反动政治背景的应予以没收，中间性的不禁止、但要重新登记，进步的应予以保护；广播电台凡属于

^① 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 年 5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57—159 页；《新华月报》1955 年第 6 期，第 19—20 页。

^② 《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转引自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反动势力的要没收,私人则禁止办。^①

这个政策实行后,至1950年初尚有五十多家私营报纸存活。但是,它们的消息来源和言论空间受到极大压缩,对读者日益丧失吸引力。例如,上海市军管会对私营报纸规定:禁止利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及帝国主义国家通讯社电讯稿;在发布军事消息、本市军管会各机关部队和政府一切有关政策及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的一切文件著作及有关政府的消息时,必须全文采用新华社消息;不得解释中共及解放军政府的法令政策。其他城市私营报纸所受内容管制也与此相近。上海《新民报晚刊》一位编辑后来回忆说,“‘超党派’立场的新闻没有了,‘内幕新闻’也没有了,‘本报南京专电’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没有了,怎样才能办好这张报纸,大家一筹莫展”。^②

私营文化事业面对的是一个让它们很难适应的中共机关报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报刊等传播工具都是党的喉舌,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发表什么、何时发表都得根据党的政治需要来决定,“不能有独立性”^③。私营报纸往日的办报策略行不通,失去了独特性和吸引力,又没有党报的政治地位和经费保障,被边缘化和被取代是早晚的事情。它们的销量一路下滑,广告收入大幅减少,不少报纸维持不下去只好停刊,到1951年8月只剩下二十多家了。一些私营报纸为求生存,接受党和政府的资金、物资或贷款扶助,这些钱物没有归还,就算作公方股份,从而形成公私合营的局面。到1953年,没有停刊的私营报纸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私营广播电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56年,私营出版业、图书零售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党和政府又逐渐退还私股,所有公私合营的文化事业都转变成为公营(国营)单位。而电影业则快得多,在文化部门的指挥下,没有经过公私合营的过渡,1953直接转为国营。

早在改造私营传播工具之前,中共就已着手扩大和充实革命战争年代所

^① 参见: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指示》,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194页;194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② 丁渝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280页。

^③ 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编委会上对毛泽东关于如何办好中央机关报的意见的转述。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建立的宣传网。至 1949 年底国营电影业拥有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厂及五十多个新闻摄影队以及一些影片经理公司。至 1950 年,初步建成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由大行政区、省及市广播电台构成的广播网;形成了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首,各省级行政区党委机关报为骨干,各种辅助政治组织(工会、青年团、民主党派、政府职能部门等)机关报为延伸的报刊网;国营出版社数量有二十多家,包括人民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等,图书总发行主要由新华书店系统承担,至 1953 年报刊总发行全部移交给邮政系统。几年后,私营文化事业消失,全国的通讯社、报刊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台及后来的电视全部都是国营文化事业、党和国家的喉舌,主要由财政经费供养。

国家在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过程中,还展开了对人的教育和思想改造,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确保中共革命理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内核的不可替代的地位。1949 年至 1955 年,发动多次政治运动,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检讨和悔改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乃至动用国家机器打倒反革命知识分子。^① 思想改造的结果是确立了革命理论的统治地位,但是,知识分子对新国家的热情也明显消减。

为调动知识分子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党于 1956 年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②,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宣称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当然,这“是人民内部的自由”^③。1957 年 3 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要“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

^①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情况,于风政有详细的史述,见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88 页。

^③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文集》编辑组编:《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1,503 页。

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①。

从 1956 年春天到 1957 年春天,宣传逐渐活跃起来。

《人民日报》在中央领导下改革,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中央允许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中央鼓励各地党报进行同样的改革。^② 刘少奇对新华社的负责人表示,不能盲目学习苏联塔斯社,也可以向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学习,“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他们的立场站得很稳”;“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③ 广播电台 1954 年以来照搬苏联经验,建立“以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的事业结构,地方台失去了地方性,1956 年中央广播事业局修改了这个政策,鼓励地方电台多办适合本地的节目。同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地方电台都增加了节目品种,其中就有自由讨论和批评不良现象的节目。

中国作家协会支持各地文学期刊“敢于发表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特别是“尖锐地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文章和作品”^④,《人民文学》就带头发表了王蒙、刘宾雁等人批判现实的小说。中国作家协会还鼓励文学期刊丢掉机关刊物的身份,取消由行政级别所形成的等级关系,平等地竞赛,追求自己的风格和特色。^⑤ 许多文学刊物更改名称,去除行政区划字眼(如《河北文艺》改为《蜜蜂》,《贵州文艺》改为《山花》,《山西文学》改为《火花》,《江西文艺》改为《星火》,《湖南文艺》改为《新苗》,《西南文艺》改为《红岩》,《内蒙古文艺》改为《草原》,《四川文艺》改为《草地》),同时一批在 1956、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14、415 页。

^② 《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6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1 页。

^③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1 页。

^④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3 页。

^⑤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3 页。

1957年新办刊物的命名也都令人联想到生动活泼的自然界景象(如陕西的《延河》,天津的《新港》,江苏的《雨花》,四川的《星星》,浙江的《东海》,福建的《园地》,沈阳的《春雷》等)。^①

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呈交了《关于改进电影制片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1957年2月获得中央书记处的批准。该报告指出,现在电影创作管理过分集中,审查层次过多、过严,影响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要对故事片的生产方式、领导方式和经营管理进行改革:下放创作权利,以导演为中心组织故事片生产;减少审查层次,电影局着重于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电影厂把握政治方向,创作组负责艺术水平;改变酬劳制度,实行基薪加酬金制度,以刺激生产;改变产销关系,发行公司分账代销或按质论价收购版权,以刺激制片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②

在1957年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号召、鼓动党外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克服官僚主义等错误。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党外人士从5月到6月通过各种座谈会和报刊等途径发表意见,参加者称之为“鸣放”。但是,在“鸣放”场合,“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③,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④。对此,中共从1957年6月展开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运动,持续了一年多。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

①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6页。

② 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5页。

③ 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1页。

④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供党内干部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4页。

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①。后果之一是中共改变了它在1956年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重新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定为主要矛盾，并认为国内存在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和其他反动派、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两个剥削阶级。^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等认定剥削阶级的复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③ 1966年，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实际上这是一次“政治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④

毛泽东对文化领域的状况一直忧心忡忡。1963年12月他在一份文件上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⑤。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4页。

^② 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7页。

^④ 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页。

^⑤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红旗》1967年第9期。

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①1966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文件称,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就是要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1966年5月、6月间,中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破除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铲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的“毒草”。^②青年学生首先响应,他们自称“红卫兵”,拉起队伍冲出校园,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召集批判会,甚至动用暴力,掀起破“四旧”、铲“毒草”风暴。随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群众树起“造反派”旗帜,“踢开党委闹革命”,夺取各部门、各单位领导权。

在造反、夺权的浪潮中,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大批文化工作者被剥夺职位和工作,文艺作品及其他文化成果基本上被封存或销毁。

1966年夏天,到处都在弃书、烧书。在一个上海儿童的眼中,“大大小小的废品回收站门口,都排满了卖旧书的长蛇阵。整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精装的《圣经》被撕成碎片,垃圾箱里随处可以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得当时还不懂事的我也兴高采烈地投入了‘扫四旧’的斗争,帮助父亲、哥哥将撕开的书页投进烧得滚烫的铁皮桶里,然后再倾入抽水马桶冲掉。父亲的脸在烟灰的飞舞中,变得越来越阴沉”。^③书被抛弃、烧毁的同时,还遭到禁印、禁售、禁阅,比如上海著名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1966年初备有社会科学图书1,792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有200种可以出售;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也成了“书的监狱”。^④全国出版图书的种数急剧下降,1965年出版约两万种,1966年减少了一半,1967年至1970年每年只有三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③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④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五千种,以后有所恢复,但是最多时也只有一万三千多种。^① 1970 年,除去毛泽东著作、图片和中小学课本,其他图书共计出版 2,773 种,其中政治读物 1,843 种,主要是报刊社论、理论文章汇编、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通讯等;农业生产、医药卫生等科技读物 298 种;文艺读物 393 种,基本上是样板戏剧本、曲谱、唱段选、剧照画册以及革命故事、革命歌曲等。^②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于 1966 年 12 月发出通知,决定停止或暂停发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 年 8 月)以前所有的纪录片和中外故事片,也就是 1949 以来十七年里所生产的国产故事片、大量的国产纪录片,以及很多外国影片(十七年间,全国生产故事片 589 部,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数千部,从国外引进影片 883 部),随即,全国各地的电影放映场所全都停止了电影放映活动。^③ 这些影片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毒草”全部被封存、禁映。各电影厂的大量创作和技术人员受到政治打击,被遣往工厂或农村进行思想改造。1966 年至 1972 年,全国各故事片厂没有生产一部故事片。其中,1967 年至 1969 年电影业只生产新闻纪录片,如《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等。1970 年至 1972 年江青指定的寥寥几家电影厂和样板戏表演团体生产了 10 部样板戏电影^④,但也只是把舞台表演的样板戏拍摄下来而已。从 1971 年开始,全国各地每年都要举行样板戏影片汇映,组织干部群众观看,有的地方甚至不惜暂停工厂和农村的生产。样板戏影片放映期间,宣传、排片、放映等环节的工作人员都相当紧张,生怕发生任何差错和事故,不然,就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给个人带来灾难。^⑤

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原名)于 1966 年 5 月制订了新的节目审查标准,规定“坏节目”一律禁止播出,所谓坏节目包括:歪曲历史真实,专写错误路线的;描写英雄人物却是犯错误的,歪曲英雄形象的;描写战争恐怖,宣扬苦难、宣传和平主义的;专写中间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的;美化阶级敌人、模

^① 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18、519 页。

^② 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8、139 页。

^③ 颜纯钧:《电影传播的奇观时代——“文革”电影的一个观察角度》,《现代传播》2010 年第 1 期。

^④ 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2 页。

^⑤ 于丽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4、115 页。

糊阶级界线、调和阶级斗争的；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扬人性论和所谓人情味的；写谈情说爱，宣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传统剧目，包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鬼戏，不管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此外，外国艺术代表团的演出要区别对待，有些国家艺术代表团的节目受西方影响很大，虽然领导同意转播，但是播出镜头处理上注意不要突出落后的部分。^① 各地电视的内容都差不多，新闻基本上是“大批判，学习班；抓革命，促生产；工厂机器转，田间麦浪翻”，文艺节目只有政治歌曲、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部电影。^② 不过，由于电视机普及率极低，全国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电视。截至 1975 年底，全国电视机数为 46.3 万台，平均 1600 人才拥有一台电视机。^③

广播电台除了读报刊上的政治文章，就是播政治类文艺节目。1967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地方广播电台以转播中央台节目为主、自办节目为辅。^④ 1969 年 1 月，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发通知说，地方广播电台的宣传“应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审定的，在《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公开发表的文件、社论、消息、文章为准，凡与中央口径不一致的，凡中央报刊不发表的，电台一律不得广播”^⑤。1971 年 9 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请示姚文元后决定，除《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的文章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将多播送未转载的《红旗》杂志的文章。1972 年 1 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问题向中央递交的请示报告提出：“新闻广播主要采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稿件。《红旗》杂志的文章，新闻节目除选播《人民日报》转载的外，只广播经过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广播的。其他报刊的文章，除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者外，一般不广播。”^⑥ 中央人民广播电

^① 吴素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54 页，转引自高鑫、吴秋雅：《20 世纪中国电视史论》，学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 页。

^② 方汉奇主编、陈业劭本卷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0 页。

^③ 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3 页。

^④ 1967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要求占领地方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立即退出，由当地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出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台的节目；1 月 23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允许地方广播电台在转播中央台节目之外，自编一部分节目。转引自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台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0 页。

^⑤ 转引自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台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6 页。

^⑥ 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关于改进中央电台新闻广播的请示报告》，转引自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台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 页。